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校園現象----大學生之生涯決定

許多大學生從大一入學即面臨到是否要轉系、選擇輔系或雙主修的生涯問題，到了大三、大四又要煩惱畢業後到底是要就業還是繼續念研究所，或者研究所是否需要轉換跑道等等的生涯決定問題。國內的相關調查結果亦指出，每當經濟不景氣時，學校就成為提昇競爭力及暫時的避風港，學生一方面利用機會充實自己，提昇競爭力，一方面延緩進入就業市場的時機，避免失業的壓力。而行政院主計處甫完成的八十九年人力運用調查結果顯示，當前國內就業者低度運用的情況有日益嚴重的態勢，「學非所用」之人數占就業總人口的七·四五%，創下歷年新高的窘境。在政府與民間投入大量人力為高等教育盡心盡力的同時，如何能真正做到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使其達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境界值得深思。

二、諮商經驗----大學生的家庭對其生涯決定之影響

在大學諮商中心進行生涯諮商的實務經驗裡，研究者看到家庭在不同層面上對於大學生生涯決定的影響。就自我層面而言，個體長期受到父母的呵護照料，對自己的認識其實相當模糊。有些學生即使念到最好的學校、最熱門的科系，但因為與父母的互動過程中長期感受到被否定經驗，使得他們無法看到自己的能力，只知道父母對自己的期待，卻不知道自己的興趣何在；在資訊蒐集方面也發現，身處一個資訊快速流通的社會並未增進大學生對於工作世界有更多的瞭解，甚至發現個體有許多社會現實的訊息往往來自父母，像是一些產業的發展狀況、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就環境部分來看，社會環境雖是規劃未來生涯的主要壓力、焦慮來源，但是家庭環境往往扮演著調節的角色；從發展的角度來說，大學生的家庭多處於起飛期的家庭週期，個體努力在自我認同與親密關係間尋求平衡。在實務經驗上看到的是，孩子一方面向諮商師抱怨父母的干涉侵權，但另一方面也不斷訴說他對於不能擺脫這關係的影響而感到無力，陷在這樣一個兩難的困境中往往讓他無法真正地獨立自主。研究者在生涯諮商的過程中發現，大學生在面臨生涯決定時，常與原生家庭有許多難解的情緒糾葛，造成其生涯決定的困難度提高，甚至出現生涯猶疑的狀況。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Super (1990) 認為準備自己成為工作者，並從職業世界中選擇適宜的工作是大學階段的重要發展任務，也就是說大學階段是生涯決定重要的準備期。而所謂的生涯決定指的是，個體在許多選項中權衡輕重之後，做出對個人發展最有價值或最有意義的職業領域或生涯方向之決定。可是，生涯決定過程中涉及許多不可知或不能控制的因素，這使得生涯決定此一問題益顯複雜。再者，現在社會景氣低迷，畢業求職的不確定性大增，也使得生涯決定的研究變數增加、困難度提高。金樹人 (民 86) 認為「生涯之學乃應變之學」，重要的不僅是瞭解大學生當下的生涯決定狀況，更得要去評估、預測他是否具有生涯決定的潛力。根據許淑穗與張德榮 (民 88) 研究指出，生涯自我效能反映出大學生對自我狀態和情境的覺察能力，其影響及於個人之生涯初始行為和後續的生涯適應。因此瞭解尚未就業之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情形將有助於探究和預測其未來的生涯決定狀況。Taylor 和 Betz (1983) 認為生涯自我效能是提供瞭解、評估以及介入生涯決定一個很有用的架構。綜合上述，本研究探討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以求對其生涯決定有所瞭解。

Hackett 與 Betz (1981) 首先運用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解釋生涯選擇和發展上的性別差異，結果發現女性比男性的生涯自我效能低，尤其在傳統男性的職業領域中。Mau (2000) 以 540 位美國大學生和 1076 位台灣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也發現，性別對於生涯決定型態與生涯自我效能有影響。國內許淑穗 (民 87) 研究發現，大學女生在女性化工作上的自我效能較高，而男生在男性化工作的自我效能與女性化工作的自我效能相差不大。此一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的差異會反映在不同性別工作領域上。厲瑞珍 (民 90) 針對南部即將畢業之大學生所做的研究發現，整體生涯自我效能並不因為性別而有所不同。到底在現今一直強調兩性平等的台灣社會是否仍存在著大學男女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上的差異，或者這樣的性別差異情形是否反映在大學生不同的科系類別上，這些是本研究希望進一步釐清的。

而就不同的職業領域或科系來說，Luzzo (1993) 與 Peterson (1993) 分別以大學生為對象做研究，結果均發現傳統職業科系與非傳統職業科系的生涯自我效能有所不同。而國內郭玟嫻 (民 91) 以科技大學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工程學院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顯著高於管理學院。的確，隨著

高科技的發展，理工科系大學生的出路比較有保障。然而，人文社會科學類組的學生在未來前途不確定的情況下，是否會出現其生涯自我效能偏低的狀況，這也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再者，生涯自我效能源自於個人的生活經驗，隨著個體年齡漸增，生活空間擴大，生活經驗累積，這些都有可能改變個體的生涯自我效能。因此本研究假設生涯自我效能與年級有關，並希望藉由研究結果進一步瞭解。

林清文（民 83）認為透過不同的探索活動，能增進個體的生涯知覺，有助於個體釐清未來的生涯方向，進一步訂定具體的生涯計畫。由於大學生正處於生涯定向的關鍵時期，需要藉由生涯探索來增進自我瞭解，並蒐集相關的職業訊息，才能漸漸提昇其生涯自我效能，進而做出生涯決定，因此大學階段的探索變得更加重要（Phillips, 1982）。大學生生涯探索的方式包括雙主修或輔系的選擇、打工、參與社團等等。由於在選擇所要修習輔系或是雙主修的領域之前，個體得去思考其生涯方向與規劃，此一過程有助於引發對自我與工作世界的探索，進而提昇其生涯自我效能。而國內有些研究也指出有工作經驗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高於沒有工作經驗者（黎麗貞，民 86；厲瑞珍，民 90；郭玟嫻，民 91）。因此本研究欲瞭解不同修課狀況（有無雙主修或輔系），以及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是否會有所差異。

Mau（2000）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不同生涯決定狀態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並不相同。金樹人、林清山、田秀蘭（民 78）依據 Marcia（1980）的統整理論及 Crite（1981）之生計決定理論，將大專生的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分為五大類，包括「迷失方向」指的是因為對自我認識不夠，而容易受權威影響。這類學生不知道自己以後該選擇何種職業較好，也覺得不需要去考慮這問題；「焦慮性未定向」指的是因為模糊不確定的感覺而導致焦慮，對於未來該怎樣選擇感到困惑而無法決定，卻又認為再多的探索也無濟於事；「探索性未定向」指的是個體因為探索不夠，所以對於未來生涯方向感到困惑無法決定；「他主定向」指的是個體並未經歷過困惑或無法決定的階段，但他們已經有確定的目標，但此一目標通常並非他們自己的決定，而是父母或重要他人替他作的；「自主定向」的學生並不一定是最具有成就或是能力最強，但其內在的整合感較高，社會適應情況較好。因此本研究採用金樹人等人（民 78）五種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分類方式，來探討不同生涯定向情形之國內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是否有所不同。

生涯涉及個人發展的問題，也關係著個人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這包括個人在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家庭的發展階段，個體在家庭脈絡中所習得面對壓力、焦慮的因應模式，家庭成員的分化程度，以及家庭受社會型態變遷的影響。Lopez 和 Andrews (1987) 認為生涯定向問題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個人與家庭間關係轉換的結果。游淑瑜 (民 92) 的研究發現，結構家庭治療學派認為美國家庭孩子問題的產生是源於孩子的「獨立我」未能發展；而華人家庭孩子問題的產生是源於「關係我」的要求，此研究結果點出關係在華人社會 (包括：台灣、香港、新加坡) 子女發展自我過程的重要地位，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原生家庭對於國內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的影響，藉以釐清家庭互動關係是怎樣影響個體的自主發展，亦或說是家庭藉由怎樣的方式去強化或抑制個體的「轉變」(transformation)，進而創造或維持「猶疑」(indecision) 的氣氛 (Lopez & Andrews, 1987)。

Paul, Daniel, Kathleen, 和 Spencer (2002) 研究指出加入原生家庭動力評估有助於生涯衡鑑，也可讓當事人瞭解家庭在其生涯發展與決定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這對於生涯諮商很有幫助。雖然持續有研究探討家庭互動變項與不同生涯變項之間的連結 (Blustein et al., 1991; Lopez, 1989; Whiston, 1996)，但是家庭與生涯之間的關係其實仍不夠清楚。而針對這些不一致結果的一種可能解釋是，家庭變項與生涯變項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舉例來說心理分離有困難的狀況會造成個體生涯猶疑，但卻也有人可能因此倉促草率地做出決定，瞭解個人主觀知覺感受就變得很重要。因此本研究強調，藉由瞭解親子互動關係中的自我感受來釐清家庭對於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的重要性。

大學生正面臨吳就君(民 88)所提「起飛期家庭」(launching family) 的成長階段，在此階段的孩子經歷了第一次的長期離家經驗，或是開展了自己不同的生活面貌，並準備真正地脫離原生家庭以開展自己的另一個家庭與人生。此時期的孩子更易感受到親子間「親密或干涉」的互動狀態 (引自修慧蘭、孫頌賢，民 91)。以結構家庭學派的觀點來說，在起飛期的家庭更需要有清楚的親子界限，而這在臨床經驗上呈現在不同的家庭中又有不同的歷程。若父母在此時期過度涉入孩子的生涯決定，是否正意涵著親子界限的薄弱甚或是功能不良呢？以生涯猶疑來說，個體知覺到父母矛盾地去要求一條出路 (做出生涯決定)，但在此同時父母卻也釋放出兩個彼此衝突的訊息----「要獨立」以及「別做任何讓我們失望的事情」，這樣矛盾的訊息也讓孩子在生涯決定上難以產生高效能的決定。個體在此階段的

任務就是學習準備脫離原生家庭，以開展一個自己的人生（修慧蘭，民87）。而這種想要自主，但又需與家人維持親密的衝突心情，反映在實務工作上的現象是----大學生面臨得能夠勇於表達要與家庭分離，才能進一步去發掘自己能獨立決定的一面，此時如果家庭面對個人這樣的需求未能給予支持、鼓勵，則會讓個體陷入兩難衝突，而這正與青少年家庭中親子「界限」的議題有關。

綜合上述可知，家庭親子界限在大學階段是個相當值得研究的議題，透過對它的瞭解有助於釐清大學生的生涯問題。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大學生知覺之家庭親子界限來澄清家庭對其生涯自我效能的影響。

綜合上面敘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情形。
- 二、探討大學生知覺之家庭親子界限與其生涯自我效能間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問題

- 一、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級、科系、有無雙主修或輔系、打工經驗、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情形如何？
- 二、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級、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之家庭親子界限狀況如何？
- 三、大學男、女生的背景變項（年級、科系、有無雙主修或輔系、打工經驗、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及所知覺的家庭親子界限（親子關係層面：親密、侵犯、相安；自我層面：認同、否定、壓抑）與其生涯自我效能間的關係為何？
- 四、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之大學男、女生的背景變項（年級、科系、有無雙主修或輔系、打工經驗）與所知覺的家庭親子界限與其生涯自我效能間的關係？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大學生

本研究所稱之大學生，係指來自於父母均在的完整家庭，且目前就讀於台灣省之各公私立大學在學學生。

二、生涯自我效能

生涯自我效能 (career self-efficacy) 乃是個人面對生涯決定問題時，對自己解決此類問題的信心程度。在本研究中，以受試者在謝宏惠 (民 79) 參考 CDMSE (Tayler & Bets, 1983) 所編訂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之得分為指標。生涯自我效能的內容包括：「正確的自我評價」、「蒐集職業相關資訊」、「目標選擇」、「規劃未來」、「問題解決」五個向度，量表總分越高表示個體對於做出適當的生涯決定之信心程度越高。

三、家庭親子界限

家庭親子界限是一種個體在親子關係中自我經驗的隱喻，其不僅代表客觀的關係型態，更是個體透過親子互動關係，而形成對自我感受的描述 (孫頌賢、修慧蘭，民 93)。本研究採用修慧蘭、孫頌賢 (民 91) 提出的家庭界限模式及所編製的「家庭親子界限量表」，藉由對家庭中親子次系統互動樣貌的描述及其互動樣貌下個體自我感受來瞭解其家庭親子界限。本量表可分為關係及自我兩個分量表。親子關係分量表的內涵包括「親密」、「侵犯」、「相安」三個概念。個體在親密內涵上得分越高，表示與父(母)的親密程度越高。在侵犯內涵得分越高者，表示父(母)侵犯個體的程度越高。在相安此一內涵得分越高者，表示個體家中親子間彼此有意地維持表面平衡的互動情形越多；而自我分量表的內涵包括「認同感」、「否定感」、「壓抑感」三個概念。在認同感這一內涵得分越高者，表示個體與父母互動過程中有較多被認同與平等對待的經驗。在否定感這一內涵得分越高者，表示個體在與父母的互動經驗中，有越多的被侵犯與不被信任、接納的感受。在壓抑感這一內涵上得分越高者，表示個體在與父母的互動過程中有越多疏離與退縮的經驗。